清史研究的新开拓

——读《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李治亭

张玉兴同志新作《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以下简称《选注》），最近已由辽沈书社出版。它以崭新的选题，丰富的内容，以及它所展示的清代东北辽阔的多少带有悲怆意味的历史画面，深深地吸引了我，一口气读完，耳目一新，顿生美不胜收之感。读书当先读序言或前言。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为本书作长篇“序言”，是对《选注》以分析见长的精彩评介，所论无不允当；而作者所写“前言”，已把《选注》的内容概述无遗。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清史研究者，还想就《选注》说几句话，不过继他们之后发一点余论罢了。

一

勿庸置疑，《选注》既然选的是诗作，当属文学艺术范畴。因此它首先是一部诗集。我读的诗不多，但据我所知，编选和解注清代东北地区被流放的文人学者的诗集，这在建国四十年来还是首次。本书共收诗人为五十四位，选诗六百一十四首，加上作者注释，凡五十二万余字。规模之大，包容之广，选录之精，与近年出版的古诗选相较，毫无逊色。诚如戴逸先生论断，《选注》是“迄今为止搜罗流放诗人及其诗作最丰富、最完备的选本。”过去，文学界一直把注意力贯注于历代名家正宗之作，言诗必称唐、词必推宋、曲必崇元，诸多选注，重复迭出，一个时期内已呈“饱和”状态。而湮没或不显的角落，在在皆有，却被人们严重地忽略了，甚至遭到轻视，不屑一顾。不言而喻，清代中国东北角这块广大土地和她哺育的那么多诗人及其诗作，也在被遗忘之内。由于这些诗人是流放的囚犯和他们的部份亲属，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他们本人与诗作，难得见天日，而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们还被埋没，就不能说公平了。

张玉兴同志在潜心于清史研究中，发现了他们的存在，有感于他们的浩然正气，尤其是估量到这批诗作的重要价值，竟不惜数年之功，把他们从历史的积沉中呼唤出来，编辑成书，自成一选本，体系井然，蔚然大观，其诗选亦形成与它类诗选迥然不同的格调。从文学的意义上说，《选注》实为文学的一项拓荒之作。作者发掘文学历史遗产之功是不可泯没的，特别是他为明清时代的文学研究提供的这部《选注》，极其宝贵，足以弥补以往此项研究中的空白。因此《选注》的问世，开扩了人们的文学视野，并将推动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

《选注》中诸诗作，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如何，这需要文学家们去研究，去评论。这里，从清史研究的角度来衡量，其价值并不比文学差，甚至可以说，它在许多方面显得更重要，确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只能从史学的价值来确定这部《选注》的重要性和它给予我们的启示。

首先，应当明确，举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包括诗作，是否具有史学研究的价值？回答是肯定的。以往以文字记述和反映历史，可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历代史官或史家直接以文字表述各个事件的始末及人物的生平行状，如二十四史、时人笔记、碑刻、方志、谱谍等；一种是采用形象构思，艺术加工，出神入化地勾勒出各该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杜甫、李白、苏东坡、关汉卿这些名垂千秋的大艺术家的诗词戏剧之作，皆可称之为“史诗（词）”。不妨说，历代各类文艺作品皆史，当无疑问。其实，在古代本来文史不分家，两者融为一体。如，《诗经》、《史记》等名著。在文字使用上，文与史本无严格限定。所不同的是，两者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不能同归。这就是历史不能有半点虚构，必须是真人真事。故秉笔直书，不隐晦，不曲笔，构成了文字记史的基本原则。而文艺作品不必尽真人真事，可以创造人物。可以虚构。即使如此，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形象概括和生动的反映。至于直接描述某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事诗，在本质上更接近史学记述。

从事史学研究的，一向把史家直接记叙历史的文字资料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倾向，即忽视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价值，或以为历代诗歌、小说、戏剧等等，似与史学无缘，因而不予注意，更谈不上如何从中开掘出新史料。的确，这个观念长久地影响乃至支配着我们，这多少限制了我们的视野，甚有碍于史学研究的深入。《选注》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这部丰富的历史诗篇中蕴藏着大量的至为珍贵的史料，只要我们稍作研究，不难做到将其艺术形象的描述，还原为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

《选注》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描述了清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日常社会生活的面面观，不少诗篇歌詠了东北壮丽的自然景观，徘徊于前朝的历史陈迹面前，发出深沉的感叹和反思，等等。这些诗篇构成了一幅清初东北的完整的历史画卷。诗作者们通过自己的笔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许多重要的且不见诸官方记载的史实。对于我们来说，或可纠正官史记载之错讹，或补充其有意之隐漏。所有这些，都是对清代历史的极为有价值的丰富和填写。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且从《选注》中举出若干例证，来阐明这一观点。

从宏观上来考察，《选注》向我们揭示了清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流人”问题。它是清朝统治者制造的文字狱的直接恶果之一。据史载统计，康雍时期，因文字得祸而被流放到东北的人员和他们的亲属达十余万人。而《选注》收入的五十余位诗作者，是清朝的政策及其社会后果的一个缩影。它使我们看到了一幕幕人间惨剧，其诗作无不对此作了有

力的揭露和抗争。他们身处逆境，仍不改高洁情操。这些饱含血泪的史实深刻揭示了清朝是如何摧残文化、血腥镇压汉族文人学士的，也是它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无疑，《选注》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清人关前，已经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那时，这一广大地区主要是辽东一带，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清朝入关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更兼满、蒙、汉八旗及其家属"从龙入关"，遂使已呈现繁荣的东北（主要是南部）地区，顿时改观。据朝鲜人目睹实况记载，辽东城镇几乎荡然一空。其后，清朝为保护其"龙兴"之地，颁布法令，严禁关内人进入东北。在百余年间，东北几乎成了蛮荒地带，只有被发遣的"罪犯"——流人放到这里，与兽群为伍了。《选注》的大量的诗篇描写了清初东北的荒凉景象。如，地近山海关的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流人行此，"竟目蒿莱路，茫茫少爨烟。"（《选注》页118，下同）又如，"白骨聚鸦寒带雨，荒城宿虎夜横秋。""败亡二十载，枯骨尚如麻。"连原都城沈阳也是"人屋半荒芜"（页2）！类似的描述比比皆是。清初东北的空旷荒凉的景况，我们所了解的远没有《选注》描写得那样深刻，因为清代文献记载实在不多，我们对清初东北的认识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无法形成完整的概念。《选注》的每首诗都是作者们各自的生活见闻和体验，从而汇集成清初东北的广阔的历史画面。它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把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富饶的东北，变成荒芜人烟的原野，延缓甚至中断其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清朝推行极端错误的政策的又一恶果。因此，我们从《选注》不仅看到清初东北的历史状况，更重要的是，要深刻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内在原因，看清它对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具体诗作而言，可以说，几乎每首诗无不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内容，有的则是对历史的直接记叙。且看流放诗人对原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所居铁岭的描绘，《选注》共选得六首，《李将军看花楼》、《万花楼》、《万花楼石梅歌》、《铁岭城》等，如说："故李将军此用兵，辖金十万铸严城。"他名为"防边"，实则于城东门外另建豪华的别墅万花楼以居。"风雨愁歌花树曲，黄昏争汛木鱼声"（页94）；"雕档翠幌注天涯，休沐材官唱晚衙"（页61）；"忆昔升平辇至时，五千貂锦竟称奇。啼花雀飐金钗影，醉月人翻玉树词。"（页203）李成梁所居万花楼早已灰飞烟灭，然而这些戍边的流人们却看到了它的残迹，访之故老，故有此一系列的描写，把李成梁及其千百达官贵人的豪奢淫逸暴露无遗，重现了当时明边将的腐败生活。关于李成梁和他的万花楼，官书几乎无所记述，仅有王一元个人所著《辽左见闻录》，专记万花楼和铁岭云："故老为言：万历初，辽东全盛，铁岭一卫世职至数百人，城中皆官弁第宅，无复兵民居地。复以卫城窄隘，分处城外。平辽伯李成梁父子五人相继掌兵柄，劲旅数万，雄视绝塞。附郭十余里，偏户鳞次，树色樟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余人，以香囊数十缀于袜带两端，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每未申时，夹道皆弦管声矣。"当时，其"繁华反胜内地"。此记与流人诗可互为印证，令人置信不疑。过去，王一元著系传抄本，已不易见，而流人诗又为人们所忽视，故对明万历时东北边防与将吏穷奢极欲知之甚少。如今把记史与叙事诗两者结合起来，可获历史的真实情况。

再举一例。《吴将军战场歌》是记述吴三桂与清军血战山海关，联合击败农民军的诗（页286）。作者方拱乾，原为崇祯时之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入清后，补弘文院学士，转少詹

事。后因得罪举家流放宁古塔。此诗约写于顺治十四年（1657）前后即获罪之前。吴三桂降清献关及山海关石河之战，距此不过十余年时间，他作为两朝的上层人物，故能得其史实之真。核之其它史料，诗中所述降清与战斗过程基本一致。如说："真王印出太和宫，老父头悬范家店。"更确认吴三桂受平西王之封在太和殿，其父被害于永平西的范家店亦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象这样的事例，在《选注》中俯拾皆是。

前面已经提到，过去我们一向习惯于从官方与私家史书中拾取史料，而《选注》给我们的又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以诗证史。《选注》所包含的史料即是明证。这就要求我们打破以往的成见，把历史的视野扩展开来，一方面，从历代的文学艺术包括诗词小说戏剧乃至口碑传说中挖掘新的史证，实为史学研究深入所必需；另一方面，要对这些文艺作品进行慎密地分析，并与相对应的史书反复比较，相互印证，有助于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在我们的著述中引证文艺作品中有关的史料，必能增强史实的可信度，也能使行文增色，富有文采，引人入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才能打动读者之心。一些学术著作不耐人读，其中罗列史料，缺乏文采，也是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历代文艺作品对于史学研究，同史书一样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注》不仅仅被看作文艺作品的集锦，而且应是有关清初至中叶的东北地区的史料汇编。作者的这一奉献，确属名实相当。

最后，还应当肯定作者对诗选的铨释、考辨，颇见功力。注解全面而详尽，释疑解惑，倾注了作者的学术见解，显示出作者的研究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凡属历史事实部份，必援引各类史书，多方考证，辨伪存真；凡属文学用典和各类疑难词句，则从文学的角度予以解说。除了于每首诗前简介作者，还点明该诗的主题思想，这大有益于读者对各诗的理解。玉兴同志能把文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各按不同的要求进行释解，尤属难能可贵。故《选注》对历史事实的考辨，较之其它类文学作品的释解，更胜一筹，而于文学的释解亦不逊色。这正是《选注》的基本特色和成功之处。

戴逸先生指出："做为开拓之作，本书也不无可议之处。"他提出的几点希望和改进意见，是很正确的。这里，只强调在史实的考辨上有待加强。如，《吴将军战场歌》，其中对石河的位置、李自成于山海关参战兵力等问题的释解尚有失误。类似的问题，学术界已获解决，《选注》可以直接引用这些正确的研究成果，不至有误。当然，如有可靠证据，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学术新说。总之，我们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时，应当对当前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予以充分重视，尽可能加以吸收，才能提高其论著的水平和质量。总之，从学术价值来衡量，《选注》是对清史研究的一项新开拓，必将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